

中国发展经济的基本经验

——纪念中国成立70周年

汪海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摘要：中国近70年来发展经济的基本经验可以从十个方面总结，包括成功地进行三次经济变革，发挥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双重叠加的作用，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相互促进，实现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促进，实现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大幅增长与各层次教育的迅速发展相结合，实现丰富的国土资源、广阔的天空资源与工业化、现代化技术相结合，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得益于经济全球化空前未有的大发展，得益于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及发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作用。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发展经济；科学技术；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700（2019）01-0003-12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70年只是短短的一瞬间，但新中国成立近70年来，中国在发展经济方面却取得了举世无双的伟大成就！这期间中国实现了由经济小国到经济大国的转变，并正在向经济强国挺进。1952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仅为5.2%^[1]。201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1 991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8%，稳居世界第二位^[2]。在科技成为第一生产力的当代，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国家强盛最重要的指标。2017年，科技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7.2%^[3]，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已大大缩小。

在近70年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在发展经济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

一、成功地进行三次经济变革

这里所说的经济变革，包括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即生产关系的总和）和作为基本经济体制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的变革。

依据历史唯物论理论，生产关系决定于生产力，但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因素中，生产关系是根本推动力。经济体制决定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但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体制在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其作用仅次于生产关系。因此，在论述新中国70年发展经济的基本经验时，首先需要分析生产关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的作用。历史也证明：正是这种变革成为新中国70年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总的说来，新中国成立后的近70年来，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三次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

第一次经济变革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1949年10月到1952年）进行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居于统治地位。据估算，1936年，在中国全部工业资本总额中，帝国主义在华工业资本占了61.4%，而中国工业资本总额只占38.6%。1946年，在中国全部工业资本总额中，官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占了67.3%，而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资本只占32.7%^{[4]①}。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农村，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封建地主和半封建富农占有了大部分土地，而占农村人口60%至70%的贫农和雇农则是少地和无地的农民。农民每年交纳的地租约为700亿斤粮食，约为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四分之一^[5-6]。

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以后，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建立。这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的根本标志。其在经济变革方面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清除帝国主义势力、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和实行土地改革，从根本上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经济统治地位，建立由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提出的，并由当时起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即由居于领导地位的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组成的经济。这期间主要通过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和清除帝国主义势力，实行土地改革和保护发展个体经济，保护并有限制地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并初步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实现了这个根本任务。到1952年，在589亿元的国民收入总额中，国营经济占19.1%，合作社经济占1.55%，个体经济占71.8%，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6.9%，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0.7%^[6]。

就国营经济来说，并不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就建立了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实际上，没收官僚资本只是把官僚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成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还包括这期间在国营经济中进行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等。因为正是这些改革，不仅使得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得以巩固起来，而且使得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所必须包括的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关系以及按劳分配关系得以建立起来。而只有这些关系都建立起来，才算得上是完整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问题在于：在没收官僚资本主义时，没有也不可能同时把原有的反映剥削和压迫关系的全部制度从根本上完整地改变过来。这些方面的根本改变，是通过尔后相继进行的民主改革（其最重要的内容是实行企业管理民主化）和生产改革（其最重要的内容是要初步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实现的。

因此，如果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仅仅归结为没收官僚资本、建立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总和的理论。

在上述基本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同时，经济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伴随全国解放和居于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特别是从1950年初开始的全国统一财经工作的胜利进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雏形也开始建立起来。这时的国民经济大部分还是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对这些经济成分，政府还是实行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所以，总起来说，这个时期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

可见，那种只注意这期间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而忽视经济体制发生相应变革的观点，同历史实际并不完全吻合。

以上分析的是占全国大部分领土的原国民党政府统治区，与此同时存在的还有日趋扩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实现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在长达二十年的战争期间，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实行的经济制度是有很大变化的。如果仅就其总的趋势作简要概括来说，那么，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和程度上实行了

① 这个数字不包括中国的东北和台湾，是按1936年不变价格计算的。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如发展国营经济,限制和消灭封建经济,保护和发展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在经济体制方面则是实行了以低水平的平均的供给制为特征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伴随全国的解放,前者进一步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轨道,后者则从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变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

因此,在论到中国第一次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如果只是叙述原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在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变化,而忽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在这方面具有特点的变化,也不能认为是全面的。

在1952年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建立以后,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苏联在这方面的实践,以及他在1952年提出的“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在1953年6月就明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7]。

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中国在“一五”时期(1953—1957年)就基本完成了对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本实现了全社会覆盖。据统计,1952—1957年,国民收入总额由589亿元增长到908亿元。其中,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占比由19.1%上升到33.2%,合作社经济由1.5%上升到56.4%,公私合营经济由0.7%上升到7.6%,资本主义经济由6.9%下降到零,个体经济由71.8%下降到2.8%^[6]。

无论是对个体经济实现合作化,还是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都不只是单纯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还包括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和分配中的关系等方面的变化。就前者来说,在合作化实现之前,是个体经济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而在合作化实现之后,则转变为集体经济内部的互助合作关系。就后者来说,在作为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之前,原来的资本家是企业的主人,而在这以后,则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内部的劳动者的一员。与此相联系,在分配方面也逐步实行了按劳分配原则。

上述情况表明:在“一五”期间中国实现了第二次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与此同时,也改变了此前存在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指令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全覆盖。这是第二次经济体制的变革,

在接下来的1958—1978年期间,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都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经济体制方面,虽然经历了1958年和1970年两次行政性分权的改进(即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内实行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下放部分经济管理权限和政府向企业下放一定管理权限),但由于采取了根本不适合经济改进的短促的群众运动方法,又缺乏实行这种改进所必需的稳定的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以致陷入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其结果是,计划经济体制不仅没有得到改进,反而有了进一步强化。

以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建立的初期,是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并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否认这一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但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强化,变得愈来愈不适合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以致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这样,改革以这种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

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确立了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提出了改革开放方针。这就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发展进程。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拓者的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8]

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党的十二大至党的十八大期间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在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方面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进一个新时代。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改革以来，又成功实现了第三次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和经济体制的变革。

中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并不是要根本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而是要把计划经济体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也是衡量改革成就的根本标尺。改革的成就涉及诸多方面，但主要是以下三点：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第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基层生产单位已经或正在改造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就其中的国有经济来说，还正在其监管层面实现从主要管企业到主要管资本的转变。第三，价格已经并正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为社会生产的调节者。

上述反映中国改革成就的三个主要方面^[9]，虽然没有包括改革的全部成就，但仍可清楚地显示：中国经济改革不仅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起来，而且使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此外，需要着重指出：改革成就还凸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做过一个精辟概括。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着力增强改革体系性、整体性、协同性，压茬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推出一千五百多项改革举措，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10] 习近平总书记这里说的改革是包括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等方面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显然，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论述，准确反映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展，尤其是准确反映了作为改革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展。

当然，中国面临的改革任务还很艰巨，还处于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要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要做艰苦的工作。但历史经验表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1]，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总的说来，这三次经济变革强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表 1 的资料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

表 1 三次经济变革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速^[12-14]

1950—1952 年社会总产值	22.9%
1953—1957 年国内生产总值	9.2%
1979—2017 年国内生产总值	9.5%

这里需要说明三点：（1）1950—1952 年年均经济增速高带有恢复性质，而且用的是社会总产值指标，对比基数也低，具有众多的不可比之处。但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这个期间的经济增速仍然是很高的。（2）预计第三次经济变革要到 2020 年才能基本完成。因而表 1 中的 1979—2017 年年均增速还没有涵盖整个期间的年均增速。（3）从 2012 年起，中国经济周期已从中波周期转入微波周期^[15]。2012—2017 年经济增速分别为 7.9%、7.8%、7.3%、6.9%、6.7% 和 6.9%；2018 年上半年为 6.8%^[14]。预计 2018—2020 年的年均经济增速将会是 6.9% 左右。这样，第三次经济变革期间年均经济增速仍会接近甚至达到 9.5%。而且，这个增速是在对比基数大大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个历史情况表明：这三次经济变革是促进中国这期间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新中国在短短的 70 年，就成功地进行了三次经济变革。这在中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在这期间中国在发展经济方面的伟大成就，也是举世无双的。这两种绝无仅有，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历史的

必然。这清楚表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状况出发,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生产关系(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的原理,通过这三次变革,强力地推进了生产的发展。

二、发挥了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经济发展的双重叠加作用

科学的产生和发展及其对社会生产作用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到了以工业为主的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到了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现代社会,科学技术还成为第一生产力^[16]。有资料表明,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科技进步对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只有20%。而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达国家纷纷由工业化阶段步入了现代化阶段。这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大幅上升。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种贡献率达到了50%,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进一步上升到60%至80%。还有资料表明,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主要成员国,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都上升到50%以上^[17-18]。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70年来,就自身来说,既拥有作为直接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又拥有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前者占主要地位。就经济发达国家来说,既有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更拥有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后者占主要地位。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引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这两方面。这意味着改革以来,中国拥有这两种科学技术资源。新中国成立后的近70年来,工业化处于由初级阶段向中后期迈进的阶段,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这种社会生产实践既有对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需要,又有对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需要,并为这两种科学技术的运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样,新中国成立后的近70年来,特别是改革以来,就形成了这两种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叠加,从而成为这期间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根本动力。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70年来,党和政府在这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使得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

在“一五时期”周恩来总理就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的任务,并强调“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19]还提出了发展科学的任务,“就是要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使外国的最新成就,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很快就可以达到。有了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解决赶上世界水平的问题。”^[19]据此,国家科委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计划,并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振奋人心的口号,这个十二年规划到1962年就基本完成了。为了进一步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国家科委接着又制定了科学发展的十年规划。这样,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尽管受到了一些政治运动的严重干扰和破坏,但仍然较好地发挥了作为生产力的科学和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的作用。前者的集中表现就是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显然,这个体系凝结了作为生产力的科学的成就。后者的突出表现就是在这期间成功地实现了当时“科学技术新发展中最高峰的原子能利用”^[19],实现了“两弹一星”工程。

改革以后,邓小平根据20世纪下半期以来经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突破,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进一步提升成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8],并使之成为改革后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方针。从党的十三大开始,就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其后,党中央相继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党的十八大还明确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十八届五中全会又确立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居于五大发展理念之首位;党中央发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了通过“三步走”战略,到2050年实现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的伟大目标。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科学技术资源方面的投入大量增长。正是这种投入的增加,为科学技术研究能

力增强及其作用的发挥创造了一系列物质条件。改革以来中国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极为显著。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由2010年的50.9%上升到2017年的57.5%^[20-21]。科技进步已经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中国科技进步也由跟随、并跑为主迈向领跑、并跑为主的新阶段。

三、实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相互促进

工业化和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史上两个相互区别但又相互联系的时代。一般说来，前者的发展为后者的发展创造了一系列条件（包括科学试验设施、生产装备和技术力量等），并对现代化发展提出了强烈的社会需求；而后者的发展可以推动前者进一步的发展，促进工业生产技术对社会生产的全覆盖。当二者并存的时候，这种纵向的相互促进作用就会变成横向的相互促进作用。而且这种场合下的相互促进作用，其力度会更大。新中国成立时，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步发展阶段。其后发展时世界经济已经迈入了现代化时代，这样，中国工业化就处于与现代化并存的时代，二者的相互促进作用也就更为巨大。现代信息技术是知识经济的最重要的代表。而作为现代信息技术最新发展的网络技术，在促进包括工业化在内的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其巨大作用已经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多年来，信息产业呈爆发式增长。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11 929亿元增长到2017年的27 452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2%上升到3.3%^[13-14]。

四、实现了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相互促进

世界史表明，伴随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劳动力和城镇人口的绝对量及其在社会总量中的占比都会上升。这种上升是城镇化最重要的指标。而城镇化的发展不仅为工业化提供了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的劳动力，而且由于城镇人口的收入水平比农村人口高，又从社会需求增加方面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这是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一般发展规律。

总的说来，中国近70年经济发展也遵循了这个一般规律的要求，并发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促进的作用。1952—1978年，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由12.5%上升到17.9%；1978—2017年由17.9%大幅上升到58.5%^[13-14]。

但在改革前，为了适应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需要，长期实行了城乡二元体制特别是相互隔离的城乡户籍制度，这就大大限制了城镇化的发展。还需要指出：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这期间还发生了两次“逆城镇化”。第一次是在1961年经济调整期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返乡。这就导致中国城镇人口增长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绝对量下降。中国城镇人口在1960—1966年的七年间分别为13 073万人、12 707万人、11 659万人、11 646万人、12 590万人、13 045万人、13 313万人。这表明从1961年开始，城镇人口数就开始下降，直到1966年才回升到略微超过1960年的水平。这个下降不只是由于大量农民工返乡，还包括城镇人口在内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中国人口出生率由1958年的34.03%下降到1961年的18.02%^[14]。第二次是数以千万计的知识青年下乡。1952—1978年中国工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为11.5%，而城镇人口的年均增速仅为4.2%，二者之比为2.73:1（详见表2）。需要说明的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增速在一定幅度内高于城镇人口增速是正常的。但1952—1978年工业增速与城镇人口增速的差距达到如此之大，则清楚表明城镇化是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这样，二者的相互促进作用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发挥。这是这期间经济发展不及改革后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2 中国工业化速度与城镇化速度之比^[13-14]

	①1952 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②城镇人口年均增速	①:②
1952—1978 年	11.5	4.2	2.73:1
1978—2017 年	10.8	4.1	2.63:1

改革以后,党的路线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来,根本改变了此前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在处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在 1978—2017 年期间,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 10.8%,城镇人口年均增速为 4.1%,二者之比就缩小到 2.63:1 (详见表 2)。而且这个增速差距缩小是在这期间第三产业高速发展及其占比超过工业的情况下实现的。这表明改革前存在的那种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已有很大改变,较好地发挥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相互促进的作用,这成为改革后经济发展显著好于改革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改革后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进展仍然缓慢,以致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未根本改变。据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提出要“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要“推进农业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22]。当前这些政策措施已经开始付诸实施。这样,长期以来存在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有望得到较快改变,并将进一步发挥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的作用。

五、实现了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大幅增长与各层次教育的迅速发展相结合

1952—2017 年,中国就业人口由 20 729 万人增长到 77 640 万人,增长了 2.75 倍;普通高校、普通高中、初中、普通小学的毕业人口分别由 3.2 万人增长到 735.8 万人,由 3.6 万人增长到 775.7 万人,由 18.5 万人增长到 1 397.5 万人,由 149.0 万人增长到 1 565.9 万人;分别增长了 229.9 倍、215.5 倍、9.4 倍、10.5 倍 (详见表 3)。中国工业化正处于由初期阶段到中后期阶段的过渡时期,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这期间手工劳动还占有一定比重,这个比重伴随中国经济的发展是趋于下降的,但直到目前它仍有存在余地。这一点在服务业的某些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大幅增长,与具有不同文化水平的劳动者人数大幅增长相结合,正好契合了不同层次的产业结构迅速发展的需要,从而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还需要指出,改革以后高等学校和留学生的毕业人数增速大大超过了改革以前。这是改革后经济增速、经济效益和居民消费水平均高于改革以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表 3 建国后就业人员和各级学校毕业人数^{[13-14]①}

	就业人员 /万人	普通高校 毕业生 /万人	普通高中 毕业生 /万人	初中 毕业生 /万人	普通小学 毕业生 /万人
1952 年	20 729	3.2	3.6	18.5	149.0
1978 年	40 152	16.5	682.7	1 692.6	2 287.9
2017 年	77 640	735.8	775.7	1 397.5	1 565.9
1978 年比 1952 年增长/倍	0.9	4.2	188.6	90.5	14.4
2017 年比 1978 年增长/倍	0.9	49.7	0.1	—	—
2017 年比 1952 年增长/倍	2.75	229.9	215.5	9.4	10.5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后中国教育的发展是之前无法相比的。据计算,从清朝末年派出留学生到新中国成立时,全国一共只有 20 多万大学生^[19]。而 2017 年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毕业生达到了近 800 万人。这一点,正是新中国经济发展是旧中国无法相比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 2017 年比 1978 年初中和小学毕业生大幅下降,是由计划生育导致的这两个阶段就学人员的大幅减少造成的。

六、实现了丰富的国土资源、广阔的天空资源与工业化和现代化技术相结合

国土资源（包括人口和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气候资源等）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少，是中国的重要国情。这里仅以海洋资源为例说明国土资源与工业化和现代化技术相结合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中国既是一个陆地面积大国，又是海洋大国。大陆海岸线长达 18 400.5 公里，岛屿海岸线长达 14 247.8 公里，二者合计超过 32 000 公里，是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23]。

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表明：从空间视角来观察劳动资料可以发现，在农业经济时代，只有土地资源作为主要的劳动资料发生作用，除了少数情况以外，一般说来，海洋资源还没有作为主要劳动资料进入人类社会的生产领域，但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时代，海洋资源就在愈来愈广泛的范围内和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劳动资料^[24]。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以后，运用工业化和现代化技术加大了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使得海洋产业迅速成为新兴的支柱产业。2011—2017 年，海洋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稳定在 9% 以上^[25]。

还需要指出，在工业化时代特别是现代化时代，从空间视角来考察劳动资源可以发现，天空领域也日益成为重要的劳动资料。中国航空工业和航天工业快速发展，使得这种劳动资源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并有望成为新兴的支柱产业。这除了主要得益于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外，也与广阔的空间领域这种劳动资料的利用直接相关。

七、发挥了优秀传统文化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文化产业已经迅速成长为中国新兴的支柱产业。2011—2016 年，文化产值增加值在第三产业中的占比已由 6.2% 上升到 7.9%。2017 年，其增加值又比上年增加了 10.8%^[26]。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促进其发展的重要元素。其典型表现，就是作为文化产业组成部分的动漫产业的迅速发展。动漫产业的许多内容就是传统的优秀文化。这方面的突出事例就是皮影戏。其众多内容在传统文化产业中早已有之，不过是以现代视频技术表现出来。当前中国许多著名旅游景点都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成为促进旅游事业发展的有利因素。传统的优秀文化还是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一代的重要内容。

传统的优秀文化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在文化、旅游和教育这些传统的产业中表现出来，而且也在知识经济时代最前沿的现代技术中表现出来。例如，春秋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墨子的思想就是“墨子号”量子通信卫星的重要思想来源。2016 年 8 月 16 日，由中国科学家潘建伟主导研制的世界首颗量子实验卫星“墨子号”在酒泉成功发射。它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和国际意义。量子通信已经克服了经典加密技术内在的安全隐患，是迄今为止唯一被严格证明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量子保密通信能够从三个方面保障信息安全。第一，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信息交互是安全的，不会被窃听或盗取。第二，“主仆”身份能够自动确认，只有“主人”才能够使唤“仆人”，而“其他人”无法指挥“仆人”。第三，一旦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的传递口令被恶意篡改，使用者会立刻知晓，从而可以重新发送和接收指令。这就使得量子通信不仅可应用于百姓日常通信，也可用于水、电、煤气等能源供给和民生网络基础设施的通信保障，还可应用于国防、金融、商业等领域，势必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科学发展产生巨大变革作用。“墨子号”的成功发射，将使中国在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构建天地一体化的量子保密通信与科学实验体系。它将有助于中国在量子通信技术实用化整体水平上保持国际领先地位，实现国家信息安全和信息技术水平跨越式提升，有望推动中国科学家在量子科学前沿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对于推动中国空间科学卫星系列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首颗量子通信卫星之所以用中国古代科学家墨子的名字来命名，是由于墨子最先提出光沿直线传播的观点。他最先通过小孔成像实验发现了光是直线传播的，第一次对光直线传播进行了科学解释。这在

光学中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理,启发了量子通信卫星的发明。量子实验卫星以墨子来命名,是为了纪念他在早期物理学方面的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作为新时代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四个自信”,这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其中的文化自信主要源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优秀文化也是一个重要来源。传统的优秀文化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源。传统优秀文化是促进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八、充分发挥经济全球化空前未有大发展时代的促进作用

从一般的共同内容来说,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包括产品和服务)和生产要素(包括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和劳动力等)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经济全球化推动社会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近代和现代人类社会进步的潮流。但对不同国家来说,其社会经济性质是有根本差别的。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来说,是商品生产者的竞争关系。就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来说,是剥削和被剥削关系。就社会主义中国的对外关系来说,中国奉行的是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的关系。

经济全球化是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相伴而生的。世界近代史表明,作为经济全球化基本实现形式的世界市场的发展,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前提,又是它的发展结果。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7]

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复杂的变化发展过程。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英国,其资产阶级革命是在1640年完成的。大体上可以把17世纪中期看作是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时期。

到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以垄断为主要特征的帝国主义阶段,世界殖民主义体系也随之形成。世界市场也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是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时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伴随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的苏俄及后来的苏联脱离了世界市场。这主要是由帝国主义国家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采取敌视政策造成的。这意味着统一世界市场的分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欧亚两洲诞生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个军事集团的对立。部分地区受到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两个平行和相互对立的市场理论^[28]的影响,统一的世界市场进一步分割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市场体系。

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由过去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转变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而且这种对外开放不断趋于完善,力度不断加大。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趋于解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两大军事集团的对立也随之结束。二战结束以后,伴随殖民体系的解体,在广大的民族独立的国家中还产生了一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从20世纪下半期开始,世界经济由工业化时代步入知识经济时代。所有这些不仅使得统一的世界市场得以恢复,而且促使其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发展。这同时意味着经济全球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当然,经济全球化如同任何发展趋势一样,与它同时存在的总有一股逆流。但逆流不可能改变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潮流。而中国在改革以后实行的不断趋于完善的对外开放政策,把这种全球化大发展转化为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2017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分别达到1363亿美元和1246亿美元,分别居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货物进出口总额和服务进出口总额分别达到4.1万亿美元和6957亿美元,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五位^[29]。这表明对外开放从资金、技术、物质和市场等方面强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对外开放奉行平等互利的基本原则,因而上述数据同时意味着中国从诸多方面促进了世界有关国家的经济发展。

九、得益于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

世界现代史表明,经济大国的崛起总是伴有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是与此直接相关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由于后来崛起的德国与先发展起来的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比较复杂。一方面由于德国再次崛起，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矛盾尖锐化；另一方面由于德国帝国主义制度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矛盾的尖锐化，导致希特勒德国把战争强加在苏联人民头上。

但在二战以后到现在的七十多年间，尽管局部战争从未间断过，但并未发生世界大战。而且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时间内，还看不到有世界大战发生的现实前景。这主要是由于这期间世界和平力量（包括社会主义国家、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世界人民）和世界战争力量（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对比逐步实现了由均衡到超过的转变。当然，只要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世界大战的根源就不可能根除。但依据当前世界和平力量和战争力量的对比，还看不到世界大战发生的现实性。

中国从经济小国到经济大国的转变，就是在这种世界和平环境中实现的。显然，这是中国经济持续稳定迅速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十分重要的国际环境。

十、总起来说发挥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作用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阶段。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最大实际结合起来，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继而又依据毛泽东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结合起来，正确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推进到第二阶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含极为丰富的内容。其核心就是包括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个中心就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实现作为社会主义社会根本任务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30-31]。四项基本原则不仅是坚持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所绝对必需的，而且是其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是经济建设的根本动力。

其后的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战略做了一系列坚持和提升，使其逐步趋于完善。这些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要求的经济战略的实施，使得各生产要素的效率得以充分有效地发挥出来，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五位一体”的总体部署、“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和“四个自信”等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时代，并使得中国经济由高速度发展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也应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如同改革一样，既有经验，也有教训。

就改革以前来说，其教训主要有二：一是盲目追求增长的高速度，忽视了经济增速与客观存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经济比例关系和经济效益的依存关系，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其结果就是多次造成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衡、经济效益大幅下挫、经济强烈波动，人民生活不仅没有得到应有改善，有些年份甚至发生了绝对下降。二是1957年下半年错误地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提法（即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发展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仍然坚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实践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使人民生活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停滞不前。

改革以后,盲目追求经济高速度的情况有很大改变,在中央政府层面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跃进”年代那样的高指标,但在这方面仍有值得吸取的教训。一是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膨胀机制治理不力。改革前盲目追求高增长是经济周期强烈波动在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反映。这种战略得以长期实施的体制方面的原因就是计划经济制度内含的投资膨胀机制。这种机制存在于国有经济的各个层次,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但主要是存在于中央政府层面。改革以后,中央政府层面的这种机制已大大改变。而中国改革是渐进式推进的,半计划半市场的状态长期存在。改革后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的独立利益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成为强有力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竞争。在半计划半市场的条件下,投资膨胀机制不仅不可能得到根除,反而会加强。长期存在的唯国内生产总值是论的干部考核指标,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机制。国有企业层面的投资膨胀机制在半计划半市场的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根除。改革以来,虽然注意了克服中央政府层面的投资膨胀机制,但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膨胀机制的治理显得不力。以致改革后虽然再未出现改革前多次发生的强波周期和超强波周期,但仍然发生了频率很高的五次中波周期。二是改革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并不明确无论是年度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的确定,还是观察现实经济增长率是否过高,其主要依据只能是潜在经济增长率。这就导致了两次对经济走势的误判。一次是1986年上半年将当时的经济形势误判为经济滑坡,因而放弃了本应继续实行的双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导致了1984年发生的经济过热在1986—1987年没有得到有效制止,一直延续到1989年。另一次是2008年采取的以四万亿投资为特征的强刺激政策,也是同这一点直接相关的,即过高估计了2008年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误以为会导致经济过度下滑,从而导致了2008—2011年经济偏热状态没有得到及时的改变。

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尽管中国在发展经济中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确实取得了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就!这个成就具有多方面的国内意义和国际意义,从总体上和根本上说来,则是彰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划时代的伟大胜利!前已述及,中国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在发展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彰显了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改革后在发展经济方面的成就彰显了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二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胜利。

参考文献:

- [1] 安格斯·麦迪森. 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M]. 伍晓鹰, 马德斌,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 [2] 新华网. 统计局: 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8260美元 世界排名第93位[EB/OL]. (2017-10-10)[2017-10-08]. http://www.xinhuanet.com/finance/2017-10/10/c_129717943.htm.
- [3] 网易. 2017年中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或达57.5%[EB/OL]. (2017-10-26)[2017-10-08]. <http://news.163.com/17/1226/13/D6JAMVV800018AOQ.html>.
- [4] 陈真.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M]. 北京: 三联书店, 1961.
- [5] 朱荣. 当代中国的农业[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 [6] 国家统计局. 伟大的十年[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 [7]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 [8]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9] 汪海波. 改革的成就、经验和意义[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8(2): 2-18.
- [10]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11] 编写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 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3.
- [12] 国家统计局. 1949—1984 光辉的三十五年[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4.
- [13] 国家统计局.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 [14] 国家统计局. 2018 中国统计摘要[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8.
- [15] 汪海波.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新发展[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7(3): 29-38.

- [16] 汪海波. 汪海波文集(第十一卷)[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6.
- [17] 马锡冠. 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M].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
-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知识与国家创新体系[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
- [19] 周恩来. 周恩来选集(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20] 光明网. “数”说历史性跨越:从统计数据看 40 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EB/OL]. (2018-08-28)[2018-10-08]. http://economy.gmw.cn/2018-08/28/content_30821135.htm.
- [21] 万钢. 全球科技创新发展历程和竞争态势[J]. 行政管理改革,2016(2):11-16.
- [2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23] 国土资源部. 中国国土资源年鉴 2017[M]. 北京:地质出版社,2018.
- [24] 汪海波. 论科学技术的历史发展[J].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15(6):75-94.
- [25] 中国海洋在线. 详解《2017 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EB/OL]. (2018-04-03)[2018-10-08]. <http://www.oceanol.com/keji/201804/03/c75726.html>.
- [26] 班娟娟. 文化产业投融资体系基本成型[N]. 经济参考报,2018-06-08(2).
- [27]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8] 中共中央编译局. 斯大林文选(1934-1952)(下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
- [29] 国家统计局网. 波澜壮阔四十载 民族复兴展新篇[EB/OL]. (2018-08-27)[2018-10-07]. http://www.stats.gov.cn/zjtj/ztfx/ggkf40n/201808/t20180827_1619235.html.
- [30] 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31] 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Essential Experien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emorating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NG Haibo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Abstract: Essential experience of the 70 years'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ten aspects: successfully carrying out economic reforming three times; playing the role of the dual of nestification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the productive force and the ones as the first productive force; inter promot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ter promoting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ombining of abundant human resources and rapid development of all level education; combining of abundant land resources, wide space resources, and technologies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playing the role of th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enefiting from the unparalleled grand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enefiting from the long period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playing the fundamental leading role of Marxism adapted to the Chinese context.

Keyword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eveloping econom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ialization; modernization; urbanization;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Marxism adapted to the Chinese context

(责任编辑: 姚望春)